

毛泽东对政党协商制度的创造性探索及现实启示

黄显中, 李盼强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摘要: 毛泽东在领导新中国协商建国与民主建政的过程中, 对政党协商制度进行了创造性的探索。作为我国政党协商制度的开创者, 毛泽东采用民主协商的形式正确处理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关系, 推动了我国具有政治性、协商性、平等性等特点的政党协商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开拓了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新境界。毛泽东政党协商制度的创造性探索, 具有突出的历史贡献和深远意义: 一是实现了我国协商建国的伟大创举, 树立起了政党协商的世界典范; 二是推动了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 开拓了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道路; 三是开辟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新道路, 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这一探索对新时代我国政党协商建设的现实启示是: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制度的根本领导,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制度, 必须充分认识新时代建构政党协商制度的重大意义, 必须坚持发扬民主协商精神传统发展建构政党协商制度。

关键词: 毛泽东; 政党协商制度; 协商民主; 政党制度; 民主道路;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开放科学(资源服务)标识码(OSID)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1)04-0041-10



政党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政治协商制度^{[1](544)}。它贯穿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制度建设的历程, 既是我国协商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 又是我国政党制度的重要内容。毛泽东是我国政党协商制度的伟大开创者和积极践行者, 在新中国立国建政的民主政治实践中, 他创造性地把政党制度与协商民主制度相融合, 推动了我国政党协商制度的创立发展, 奠定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基础。但是, 以往学界鲜有涉及毛泽东关于政党协商制度实践的研究, 这不仅无法全面凸显毛泽东作为伟大领袖开国建政的卓越历史贡献和政治智慧, 也无法使人正确理解毛泽东政党协商制度实践对我国新时代政党

协商制度建设的永恒价值和意义。本文尝试对毛泽东对政党协商制度的创造性探索进行探析, 以期为我国政党协商制度建设提供有益参考。

一、毛泽东探索政党协商制度的实践逻辑

毛泽东对政党协商制度的探索, 始终遵循着两条逻辑线索: 新中国立国建国的实践逻辑与政党协商制度形成发展的历史逻辑。毛泽东正是在领导新中国协商建国与民主建政的历史实践中, 实现了对政党协商制度的创造性探索, 从而开创了我国民主政治的政党协商制度样态。

收稿日期: 2020-06-18; **修回日期:** 2020-08-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毛泽东协商民主思想及其现代治理意义研究”(15AKS002); 湖南省双一流学科重点项目“毛泽东人民共和国道路的世界历史意义研究”(18A057); 湖南省教育厅优秀青年项目“协商民主的政治方位与实践机理研究”(18B454)

作者简介: 黄显中, 湖南桂东人, 哲学博士,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专职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毛泽东思想; 李盼强, 河南新安人, 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联系邮箱: lipanqiang@csu.edu.cn

(一) 新国家与新政治: 毛泽东探索政党协商制度的缘起与初衷

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探索新中国的蓝图萌发于抗日战争时期。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中国, 不仅是中国人民多年来的理想, 而且是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革命的初衷。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 我们共产党人奋斗的一切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中国”^{[2](663)}。为实现建设新国家的革命理想, 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 从探索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 到探索建立“苏维埃人民共和国”, 再到主张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 中国共产党人为梦想而奋斗的实践从未停止^{[3](9)}。1940年, 毛泽东初步描绘了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指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 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 而且有新文化”, 是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 一个“文明先进的中国”。^{[2](663)}毛泽东为党和人民初步勾勒描绘了新国家的美好蓝图, 同时也指明了建立“新国家”, 建构“新政治”的实践方向。

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之际,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以政党协商的政治方式建立新国家的积极探索。随着日本侵略势力逐步被赶出中华大地, 中国革命迎来了曙光, 建设一个让人民彻底不再遭受“三座大山”压迫的新中国, 日渐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迫切任务。1944年9月, 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 讨论关于召开各党派代表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的提议, “召集各党派代表会, 成立联合政府, 共同抗日, 将来建国”^{[4](348)}。该会议首次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政党联合”的方式实现抗日建国的政治主张。1945年4月,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全面阐述了政党合作并建立联合政府的一般纲领和具体纲领, 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统治, 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新中国的政治理想。1945年8月25日, 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就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发表宣言, 呼吁国民党应顺应历史潮流和人民意愿, 废除一党专政, 号召“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 商讨抗战结束

后的各项重要问题”^{[5](249)}, 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以政党协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决心和主张。

毛泽东对政党协商制度的探索, 催生于重庆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旧政协”)决议的落空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下简称“新政协”)的召开。通过促成政党之间协商建立“新国家”与建构“新政治”的政治方式, 不仅从根本上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 而且事关新中国的未来与长远发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 中国共产党号召各党派通过民主协商建立联合政府, 完成建国大业的政治主张, 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1945年8月29日至10月10日, 为顺应人民协商建国的意愿,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在重庆谈判签署《双十协定》, 决定为组建新政府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6](561)}。1946年1月10日至31日,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 各党派代表共38人参加会议, 会议经过激烈斗争最终通过“和平建国”等五项协议, 并决议在全面停战的和平条件下, 召开真正的国民大会产生民主联合政府^{[7](1-6)}。“旧政协”的成功召开和探索, 不仅初步描绘了新国家的美好图景, 而且奠定了建立新国家的协商民主基础和传统。

“旧政协”虽为政党协商建立新中国做了有益尝试和探索, 但“旧政协”达成的广泛共识在不久之后就遭到国民党的破坏, 探寻和召开“新政协”成为毛泽东领导人民建立“新国家”的必然政治选择。1946年11月15日, 蒋介石在南京单方面召开了“国民大会”, 致使“旧政协”的成果彻底化为泡影^{[8](121)}。“旧政协”虽无法改变国民党的专制独霸, 但其倡导的民主协商精神和价值却深入人心, 不仅“树立起一个协商的楷模”^{[9](112)}, 而且为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指引了政治协商方向。在协商民主精神的鼓舞下, 基于对各民主党派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独特作用的考虑, 毛泽东积极领导党和人民参与探索立国和建政的实践, 他深知建立一个人民当家作主的现代民主国家, 绝不是一个党派的事, 而是中华民族全体人民的大事, 需要广泛凝聚各阶级、各阶层、各方民众的意愿和共识^{[3](17)}。因此, 毛泽东努力

推进“新政协”的尽快召开,实际上是在寻求和发展能够最广泛代表人民利益,最充分反映人民意愿的政治协商方式,特别是政党协商方式。

(二) 新政协与新中国:毛泽东探索政党协商制度的过程与阶段

毛泽东对政党协商制度化的探索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个艰辛探索的历史过程。基于新中国立国、兴国历史进程的推进,特别是新中国政协职能的发展演变,毛泽东政党协商制度的探索经历了谋划与筹备、建立与发展、调整和确立三个阶段。

1. 谋划与筹备(中国共产党“五一口号”发布到“新政协”召开)。随着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中国革命迎来了历史转折点。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向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0](146)}的号召,拉开了召开“新政协”的序幕。在“五一口号”的感召下,各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积极合作,共同筹备“新政协”的召开,以共商建国大业。之后,为适应革命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经过与各民主党派的充分协商,中共中央决定调整“五一口号”提出的“两步走”建国方略,采用“新政协”提出的“一步到位”的策略^{[3](97-98)}。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团结合作、沟通协商,逐渐消除了相互之间的疑虑、增进了互信,统一了思想、达成了共识,为“新政协”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2. 建立与发展(1949年“新政协”召开到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北平开幕;9月17日筹备会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正式将政协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会议有46个单位共662位代表参加,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三个为新中国成立奠基的历史性文件,通过了关于国旗、国歌、首都、纪年等决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相关文件和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委员^{[11](1)}。“新政协”的成功召开不仅达成了建立新中国的广泛共识,实现了建立新中国的伟大历史创举,而且从制度意义上宣告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正式成立,实现了政党协商的制度机制与平台的伟大历史开创。

3. 调整与确立(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之后)。1954年9月15日至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等法律,全面建立起了国家领导机构。第一届全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圆满完成其历史使命,但又面临着是否继续存在及如何发展等问题^{[12](146)}。有人提出:“民主党派是争取民主而成立的,现在有了民主,民主党派的使命已尽。”^{[13](218)}针对党内外一些人士对人民政协的置疑或担心,毛泽东专门召集参加政协二届一次会议的部分党内外人士进行了座谈。首先他指出人大的代表不能包括全部,所以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其次他明确区分了两者的性质和职权,指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属于国家权力机关,而政协“不是国家的行政机关”^{[14](384)};最后,他具体阐明了各民主党派的“五项任务”,厘清了民主党派的职能,正确处理了人大与政协的关系。在毛泽东的坚持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以保留,并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及对外友好交往活动中,继续发挥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功能。

二、毛泽东探索政党协商制度的理念、原则与历史意义

毛泽东在探索政党协商制度的实践过程中,正确处理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保障推进了各政党之间民主协商制度的形成,使我国的政党协商制度呈现出政治性、协商性、平等性等特点。他探索开创政党协商制度的历史实践,对开拓我国人民民主道路,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一) 制度理念

政党协商制度既是政党制度又是协商民主制度,因而既具有政党制度的理念导向,又具有协商民主制度的价值要求。

第一,毛泽东把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关系,作为构建政党协商制度的理念导向。现代国家政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政党政治,因而政党协商制度的核心就在于处理政党关系。回顾历史可以发现,由于受西方政党政治的影响,近现代中国出现过的政党组织林林总总、数目繁多。据统计,从1911年武昌起义截至1914年“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解散,全国具有政党性质的“会”“社”“党”多达312个^{[15](366)}。到1949年9月新政协召开前,经过新政协筹备会的调查甄别,以党派身份最终参加新政协的团体共有14个,除中国共产党和8个民主党派之外,还有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无党派民主人士也作为1个单位参加^{[16](386)}。在政党协商会议中,由于存在着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双重主体,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构成政党协商制度的核心问题和内在要求,也是毛泽东推动和发展政党协商制度建设的核心关切。

在解放战争时期,一些民主党派和贤达人士提出的“第三条道路”^{[17](58)}的幻想破灭后,毛泽东并未因此疏离和孤立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而是主动谋划并积极推动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间的政治协商,以诚恳的态度和无可辩驳的事实,使民主党派充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科学主张和远大前途。从毛泽东探索政党协商制度的实践历程来看,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发布“五一口号”,敞开怀抱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合作之时;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各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务院各部门任职,以担任实职的方式与中国共产党开展政党协商之际;或者是1954年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开启各民主党派人士通过专门机构参政议政的政党协商之时,他都十分重视对政党关系的处理。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最终形成了

中国共产党始终诚心诚意尊重各民主党派的平等身份、各民主党派心悦诚服地认同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和谐政党关系。

第二,毛泽东把持续推进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视为构建政党协商制度的价值要求。回顾近现代以来的中国史可以发现,从“五一口号”发布到“新政协”的召开,毛泽东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领导探索政党协商制度实践,实现了民主建政的历史性创举。在解放战争期间,蒋介石在勾结军阀夺取政权后制定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以基本法的形式确定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政党协商制度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不但始终容许各民主党派平等地参与政治,而且还通过民主协商的方式邀请和保障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督政。民盟代表沈钧儒曾指出,各民主阶级、民主党派的“团结协商精神,是我们解决国是的主要方法,也是我们今后克服一切困难的唯一途径”^{[10](396)}。

即使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了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对多党合作的领导还是通过民主协商的形式来实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人大职权期间,一些党外人士以在政府担任实职的方式履行政党协商职能,这就充分保障了各民主党派的平等政治权利。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立之后,各民主党派继续发扬协商民主精神,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等职能。

由此可见,在正确处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之间关系方面,毛泽东一贯强调政党协商制度的贯彻落实必须体现平等,必须非常细致而又有实效,否则在我们和民主人士之间“就会有一座精神的墙隔着,妨碍民主集中制的贯彻”^{[18](393)}。

(二) 基本原则

毛泽东探索政党协商制度一贯坚持讲政治原则、讲协商原则、讲平等原则。

1. 政治原则

毛泽东探索的政党协商制度主要就关涉国家建立、建设和发展等重大政治问题开展政治协

商。政党协商制度不同于其他方式的协商民主制度, 政党的阶级属性、政治角色和历史使命, 从根本上决定了政党协商的政治范畴^[19]。也就是说, 在国家生活中涉及国家发展的一切问题, 如果不论大小、不分性质、不分领域都拿来民主协商, 不仅会严重降低决策的效率, 而且也会削弱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力。因此, 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政党协商的基本属性和范畴, 必须明晰和把握他对政党协商的功能定位。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定位和功能作用的视角可以发现, 毛泽东总是从政治的高度来看待和推进政党协商制度实践。

在探索政党协商的实践中, 毛泽东正是从关涉国家全局的长期性和根本性问题来定位和推进政党协商的。在谋划筹备阶段, 毛泽东关注的政党协商是以协商建国和民主建政为政治任务; 在确立发展阶段, 毛泽东关注的政党协商是以承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国家最高职权为历史使命; 在调整完善阶段, 毛泽东关注的政党协商回归“新政协”本位, 以履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职能为主要任务。正如毛泽东所强调的, “政协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国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的统一战线组织, 是党派性的, 它的成员主要是党派、团体推出的代表”^{[14](385)}。

2. 协商原则

毛泽东之所以在革命过程中建立政党协商制度, 是由于存在多个党派, 而政协正是处理党派之间关系的协商组织及机制。毛泽东曾多次强调“我们自己要有主张, 但一定要和人家协商”^{[20](184-185)}。他认为, 政党协商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通过各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 就国际问题、候选人名单为中国共产党提意见、做参谋, 作为中国共产党决策的重要参考^{[14](385-387)}。由此来看, 充分保障和推进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之间的民主协商, 是毛泽东探索政党协商制度实践的重要着力点。

毛泽东不仅是政党民主协商的倡导者, 也是政党民主协商的推动者。1954年在谈论人民政协的性质和任务时, 毛泽东专门提到了在社会主义改造、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制定等一系列重大问

题方面, 中国共产党需要与各方面进行充分协商^{[14](386)}。与此同时, 毛泽东还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干部要充分正确认识民主党派的地位和功能, 要积极主动同民主党派协商, 他指出民主党派“不是一根头发, 而是一把头发, 不可藐视。要团结他们, 要给事做, 尊重他们”^{[21](6)}。他把民主党派的功能喻为“一把头发”, 意在强调要以民主协商的方式来团结和凝聚各民主党派。

3. 平等原则

从政党协商制度的实际运行来看, 各民主党派平等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对中央政府的工作起协商、参谋和推动的作用。”^{[22](368)}毛泽东强调, 中国共产党必须要平等对待各民主党派, 真诚尊重各民主党派; 如果不能保障政党政治参与的平等性, 就会造成各民主党派在政党协商中的“少言”“疏言”“不言”, 不利于党领导人民为治国理政广泛凝聚共识。

政党协商的平等性尤其体现在政党监督方面, 保障政党之间协商的平等性应是政党监督的基本前提, 否则政党监督将无法有效推进。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 是人类社会伟大的政治创造。毛泽东指出, “所谓互相监督, 当然不是单方面的, 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 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23](235)}政党监督是政党双方的相互监督, 必须保障政党双方的平等权利。

(三) 历史意义

毛泽东对政党协商制度的创新性探索, 在建设“新中国”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当代中国的政党协商奠定了制度基础和优势, 具有卓著的历史贡献和深远意义。

第一, 实现了我国协商建国的伟大创举, 树立起了政党协商的世界典范。毛泽东探索开创的政党协商制度, 通过协商建国与民主建政成立新中国, 无疑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推动政党协商制度的成功实践, 实现了新中国的协商建国和民主建政, 并将这一理想转化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行动。这与美国联邦党人建立美国政府的过程相比, 无疑更具有彻底的民主典范意义和世界历史影响力。美国联邦党人通过政党协商确立了美国“三权分立”制度, 并试图将美国的建

国作为范例来向人类社会证明,“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24](3)}但是,美国联邦政府推崇的价值理念是否具有真正的民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引起全世界人民的质疑。

第二,推动了我国协商民主的发展,开拓了我国人民民主的政治道路。毛泽东是在“旧政协”基础上推进“新政协”,实现协商建国和民主建政,并开创性地建立了政党协商制度。政党协商制度不但为推进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找到了助手,而且也各民主党派提供了参政的专门通道,使人民民主得以具体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强调必须认真地团结各界民主人士,“克服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关门主义倾向和迁就主义倾向”^{[14](71)},并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党协商制度。这显然包含着毛泽东对各民主党派行使民主权利的深思熟虑。毛泽东通过协商建国和民主建政展现了政党协商的独特作用,得到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各界人民的高度赞扬与充分肯定,也更加坚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充分发扬协商民主的决心。随着协商民主制度的开辟、发展和完善,其与我国选举民主制度相互补充、协同发展,共同构成了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内容和独特优势,为新时代不断拓展人民民主道路奠定了制度基础。

第三,开辟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新道路,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毛泽东在探索发展政党政治的实践中,开辟了政党协商的新型政党制度,具有深刻的理论及现实意义^[25]。近代以来世界各国,特别西方国家在发展政党政治的实践中,形成了一党制、两党制或多党制的政党制度。近代中国在模仿西方探索政党政治的实践中,遭到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的阻挠和破坏,被迫长期陷入国民党“一党治国”“以蒋治国”的专制独裁困境。随着“新政协”的召开,毛泽东领导建立的政党协商制度,摒弃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党制”政党制度,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政党政治新路,实现了“将寡头专制

变为真正的民主政治”^{[26](617)}的政治目标,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与西方政党政治制度相比,它不仅吸收了一党制、两党制、多党制的优点,而且克服了其极端专制和极端民主的弊端,开辟了世界政党政治发展的新路径。在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发展史上,中国的政党协商制度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政党理论的发展创新。

三、毛泽东探索政党协商制度的现实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政党协商制度放在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位置,做出推进政党协商“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发展”^{[1](163)}的战略安排,为新时代政党协商建设指明了根本方向。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已经站在世界历史的新方位上。毛泽东对政党协商制度的历史实践和重要思想,穿越历史的长河依然散发着智慧光芒,对新时代政党协商制度的建设和发展仍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 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制度的领导

党的领导是政党协商制度建设和发展的根本保障。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政党协商制度的不断发展完善,无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是我国政党协商制度的鲜明特征^{[27](133)}。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我国多党合作的政党制度架构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是平等参与政党协商的参政党,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盟友,与中国共产党紧密团结、共同奋斗,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建言献策,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进步。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始终充分保障政党协商的正确方向,才能把党的统一领导与各方积极参与相结合,形成党领导下各方有效参与政党协商的制度格局。

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制度, 必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 健全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机制, 确保党始终成为政党协商制度的坚强领导核心。必须坚持党对政党协商的统一领导、整体谋划和系统部署。为此, 各级党委要高度重视政党协商, 切实提高政党协商的认识, 真正把政党协商作为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凝聚智识的协商民主平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既强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也强调发扬社会主义民主。”^{[27](134)}这就要求在加强党对政党协商组织领导的同时, 不断规范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参与政党协商的程序, 充分发挥他们的协商积极性, 提高政党协商的质量和水平, 使我国政党协商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二) 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制度

政党协商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制度形式, 也是我国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政党协商制度源于毛泽东的伟大开创, 既根植于中国土壤、彰显中国智慧, 又积极借鉴和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明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 这一制度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 在我国有根、有源、有生命力。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

新时代发挥我国民主政治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离不开对政党协商制度的坚持、发展和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独特优势”, 必须“统筹推进政党协商”等协商民主形式^{[27](215)}。

(三) 必须充分认识新时代建构政党协商制度的重大意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政党协商制度建设, 将其作为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毛泽东主席到习近平总书记, 我国政党协商制度得到持续发展, 并不断完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2015年2月, 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建设的意见》首次把政党协商置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七种协商形式之首; 2015年12月10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中阐明了政党协商的基本内涵、内容形式和程序机制, 为政党协商的发展指明了方向。2021年6月25日,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际,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白皮书, 再次阐明“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开展政党协商”的政党政治制度及发展方向^[28]。随着我国政党协商制度建设和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作为我国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 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具有开创性、典范性和引领性作用, 已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制度设计和保障。

从党和国家发展建设政党协商的战略规划来看, 政党协商制度是新时代我国国家制度的重要一环, 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而必须充分认识政党协商制度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才能将其建设得更加完善。从新时代的定位来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是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基于共同的政治目标, 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 在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直接进行政治协商的重要民主形式, 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28]。从功能作用来看, 政党协商是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人士有序政治参与、畅通意见的表达渠道, 有利于巩固发展和谐的政党关系; 新时代政党协商在协调各方面政治力量, 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战略布局中, 广泛发挥着凝心聚力、增进共识, 促进中国共产党科学民主决策中具有重要作用。政党协商制度是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真正优势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把政党协商这一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坚持好、发展好、运用好”。^{[29](76)}

(四) 必须坚持发扬民主协商精神传统发展建构政党协商制度

民主协商精神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建设和发展政党协商制度奠定的优良传统。它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最宝贵的政治遗产和精神财富。回顾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百年历程, 民主协商精神被一代又

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所坚持、传承和弘扬,成为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不竭精神力量源泉。学习总结党的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正是始终坚持和发扬民主协商的优良精神传统,才不断经受住了各种风险和复杂斗争的考验,才不断开辟和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共同奋斗,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通力合作、团结和谐”新型政党关系局面^[28]。

新时代发展和完善政党协商制度必须坚持和充分发扬民主协商精神理念。政党协商的核心在于各党派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共识、合作共事。毛泽东探索建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凝聚各民主党派及政治力量的人民民主制度安排,其根本任务就在于向中国共产党提意见,就重要政治问题做参谋,以作为中国共产党决策的重要参考。政党协商通过民主协商活动实现各党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并在决策制定和决策实施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增进相互之间的交流互动关系。因而,必须把弘扬民主协商精神理念作为发展完善政党协商制度的关键。在新时代继续发扬民主协商精神加强政党协商建设,中共中央明确指出要“继续探索规范政党协商形式”^{[1](293)}。《中国新型政党制度(2021年6月)》白皮书指出,“政党协商有会议协商、约谈协商、书面协商三种形式”^[28],因而必须发展和规范多种协商形式的政党协商,才能充分把民主协商精神贯彻到政党协商的各个环节和过程,才能不断推进政党协商的发展完善。

四、结语

毛泽东对政党协商制度的开创性探索和贡献,不仅奠定了我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历史基础,而且为新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发展打下了坚实制度根基,积累了制度优势。毛泽东领导探索的政党协商制度,创造了一种新的政党政治模式,超越了旧式政党政治制度,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重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继承和发展政党协商制度。政党协商制度已在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建构亲密合作政党关系中显示出独特优势和强大生命力。因此,持续推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不断坚持、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协商制度,充分发挥其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制度优势和作用。

参考文献:

- [1]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
Selected important documents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Vol.2 [M].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6.
-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Selected Works of MAO Zedong: Vol.2[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 [3] 陈扬勇.建设新中国的蓝图[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CHEN Yangyong. Blueprint for building a new China [M].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Literature Press, 2013.
- [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形成与发展大事记[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Literature Research Office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Chronicles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AO Zedong thought[M].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1.
- [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5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Selected documents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Vol.15[M]. Beijing: Publishing House of the Party School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1991.
- [6] 孙建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通史: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SUN Jianhua. General history of Marxism in China: Vol.2[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9.
- [7] 王树棣,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史[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
WANG Shudi, et al. History of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M]. Harbin: Heilongjiang Education Press, 1991.
- [8] 沙健孙.中国共产党史稿(1921—1949):第5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
SHA Jiansun. Historical manuscrip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1921—1949): Vol.5[M].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6.

- [9] 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on the United Front [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4.
- [10] 杨建新, 等. 五星红旗从这里升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诞生记事暨资料选编[M]. 北京: 文史资料出版社, 1984.
YANG Jianxin, et al. Five star red flag rises from here: 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nd selected materials[M]. Beijing: Literature and History Press, 1984.
- [11]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2009)[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Research Office of Party Histo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Memorabil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2009)[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9.
- [12] 柳建辉, 曹普. 中国共产党执政历程: 第2卷(1949—1976)[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1.
LIU Jianhui, CAO Pu. The ruling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Vol.2 (1949—1976)[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1.
- [13] 庞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1949—1956[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0.
PANG Song.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49—1956[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0.
- [14] 毛泽东文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MAO Zedong Anthology: Vol.6 [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15] 彭明, 程歆. 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PENG Ming, CHENG Yi. The ideological process of modern China[M].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6] 杨胜群, 陈晋. 亲历者的记忆: 协商建国[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9.
YANG Shengqun, CHEN Jin. The memory of the witness: Building a nation through consultation[M]. Beijing: Life, Reading, Xinzhi SANLIAN Bookstore, 2009.
- [17] 胡乔木. 胡乔木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Hu Qiaomu. Collected Works of Hu Qiaomu: Vol.2 [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2.
- [18] 周恩来选集: 下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Vol.3[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4.
- [19] 周淑真. 政党协商——多党合作制度的核心要素[J]. 世纪行, 2016(2): 29—31.
ZHOU Shuzhen. Party consultation—The core element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system[J]. Shijixing, 2016(2): 29—31.
- [2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研究室, 等. 老一代革命家论人民政协[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Research Office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etc. The old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ies on the CPPCC[M].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7.
- [21] 中共中央统战部研究室. 历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概况和文献[M]. 北京: 档案出版社, 1988.
Research Office of the United Front Department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verview and documents of previous National United Front Work conferences[M]. Beijing: Archives Publishing House, 1988.
- [22] 周恩来选集: 上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0.
Selected Works of ZHOU Enlai: Vol.1[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0.
- [23] 毛泽东文集: 第7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9.
MAO Zedong Anthology: Vol.7[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9.
- [24] 汉密尔顿, 杰伊, 麦迪逊. 联邦党人文集[M]. 程逢如, 在汉, 舒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HAMILTON A, JAY J, MADISON J. Collected Works of Federalists [M]. Trans. CHENG Fengru, ZAI Han, SHU Xun. Beijing: Commercial Press, 1980.
- [25] 李雅兴, 伍安. 毛泽东政党协商的伦理思想及其现实启示[J]. 中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6(01): 144—151.
LI Yaxing, Wu An. MAO Zedong's ethical thought of Party consultation and its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20, 26 (1): 144—151.
- [26]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中卷[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MAO Zedong's chronology (1893—1949): Vol.2[M]. Beijing: Central Literature Press, 2002.
- [27]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Guidance Book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s decision on several major issues concerning upholding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 characteristics and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9.
- [28]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新型政党制度(2021年6月)[N].人民日报,2021-06-26(02).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s new political party system (June 2021) [N]. People's Daily, 2021-06-26 (02).
- [29] 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XI Jinping's excerp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politics[M].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7.

Mao Zedong's cre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party consultation system and its practical enlightenment

HUANG Xianzhong, LI Panqiang

(School of Marx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leading the new China to build a nation through consultation and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Mao Zedong made a creative exploration of the Party consultation system. As the founder of the Party consultation system in China, Mao Zedong correctly handl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democratic parties in the form of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promoted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Party consultation system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litics, consultation and equality, and opened up a new realm of China's democratic political system. Mao Zedong's creative exploration of Party consultation system has outstanding historical contributions and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Firstly, it has realized the great pioneering work of building a nation through consultation in China and set up a world model of Party consultation; Secondly, it has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deliberative democracy and exploited the political road of people's democracy in China; Thirdly, it has opened up a new roa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party politics, innovated and developed Marxist party theory. The practical enlightenments of this explora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Party consultation in the new era lie in that we must stick to and strengthen the party's fundamental leadership over the socialist Party consultation system, unswervingly adhere to the socialist Party consult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ully understand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building the Party consulta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and adhere to carrying forward the tradition of democratic consultation spirit as well as developing and constructing the Party consultation system.

Key Words: Mao Zedong; Party consultation system;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party system; democratic road; Marxist party theory

[编辑: 游玉佩]